

老北京文化丛书

老北京的大寺庙

京华古刹广济寺

什刹海地区的寺庙

报国寺

隆福寺

◎ 文安 主编

古

刹

寻

踪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老北京文化丛书

古刹寻踪

◎ 文安 主编



RA054/07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刹寻踪/文安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05. 1

(老北京文化丛书)

ISBN 7 - 5034 - 1583 - 5

I. 古… II. 文… III. 寺庙 - 简介 - 北京市
IV. K928. 7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4144 号

责任编辑: 梁志安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印 装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印 张: 6.375 字数: 85 千字
印 数: 5000 册
版 次: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17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老北京文化丛书

前 言

北京是闻名世界的古城。她从原始聚落、古燕城邑、北方重镇一路走来，从辽代陪都、金代中都，直到元代大都，明、清京师，渐次走向辉煌，成为华夏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繁华喧嚣的都市街巷、巍峨壮丽的宫殿楼台、秀美庄严的离宫苑囿、敕建恢弘的古刹寺庙绘成了古都的人文景观；传统的民俗民习与各民族文化的相融相习，形成了老北京的礼俗风情。要解读北京的文化底蕴、了解京都市民的生活，通过此书选取的历史遗迹、遗风片段，或许对你能有所帮助。

本书资料源于全国政协文史系统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，其中北京市政协、东城区政协、西城区政协、宣武区政协、崇文区政协文史部门编撰的史料为本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。在此向辛勤耕耘的文史工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目
录

1 老北京的大寺庙 全 信

京都古刹林立，其中佛教寺庙以内八刹、外八刹和三山最为著名。梵刹庄严清净、远离尘嚣，暮鼓晨钟、香烟袅袅，有城市山林之美境。

22 京华古刹广济寺 成善卿

51 妙应寺白塔 徐双春 王彬

68 护国寺 乐薇 徐双春

71 什刹海地区的寺庙 王铭珍

北京的寺庙多为敕建，规模宏大，殿堂巍峨，香火旺盛。什刹海地区的寺庙最为密集，据说这里的神灵最为灵验，深为皇家所重视。

81 广化寺 祥慧 志山

90 拈花寺 圣 泉

108 净业寺 傅耕野

112 报国寺 刘盛林

许多寺庙的兴建都有着不同的说法和理由，一般难为世人所知。报国寺从表面上看也是明宪宗为母后“祝禧迎诞”而建，但真正原因却另有一段传奇般的故事。

- 120 法源寺 关仁杰
117 长椿寺与浙寺 叶祖孚
168 隆福寺 傅耕野

隆福寺曾为京师巨刹，规模宏阔，制造精巧，是明代朝廷的香火院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它的消失却是因一个瞌睡中的喇嘛弄翻油灯引起大火而化为灰烬。

- 172 通教寺 密然等
191 大觉寺 张蕴芬

老北京的大寺庙

古

刹

寺

塔

全信*

京都古刹林立，其中佛教寺庙以内八刹、外八刹和三山最为著名。梵刹庄严清净、远离尘嚣，暮鼓晨钟、香烟袅袅，有城市山林之美境。

北京的庙宇很多，其中佛教的寺庙就有数百处，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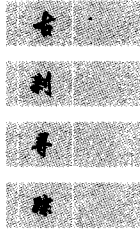
* 作者原系天津佛教会常务理事，已故。

以内八刹、外八刹和三山为最著名。内中除了处于特殊地位在中南海内的万善殿以外，柏林寺、嘉兴寺、广济寺、法源寺、龙泉寺、贤良寺、广化寺、拈花寺为内八刹；觉生寺、广通寺、万寿寺、善果寺、南观音寺、海慧寺、天宁寺、园广寺为外八刹；而潭柘寺、西域寺、戒台寺称为三山。兹就我长期挂单的上述大寺字中的一些内幕，就亲身见闻，分别扼要说明如下：

龙 泉 寺

龙泉寺在北京宣外南下洼子。清光绪年间，由湖北人明净做住持。他的法徒有脱尘、百川二人，都是湖北籍。明净与象坊桥观音寺（龙泉寺的下院）住持觉先（湖北人）友情最好，往来甚密。他两人首创南方人在北京寺院做住持的先例。

觉先曾在日本学习法律，与日本首相犬养毅同学。回国后，中年出家，后在汉阳归元寺时与明净同参。光绪年间来京，在象坊桥观音



寺（宣武门内）做住持。后来，明净与觉先联合湖南等各省在京的僧人，于1919年左右，在象坊桥观音寺成立南方佛教会。觉先资格最老，被推为会长，明净任副会长，与当时全朗领导的北方佛教会分庭抗礼。觉先与黎元洪等要人素有往来，所以龙泉寺、广济寺、法源寺、通州华严寺、四眼井龙圣庵等处由南方人做住持的寺院，遇事必问计于觉先，因此觉先的地位，就相当于各寺的盟主。先是该寺在道兴做住持时，曾亲往上海募款数百元，归后建立了龙泉孤儿院。明净在清末，由观音寺住持觉先支持，接办了由道兴在龙泉寺内创办的孤儿院，并用向京各界募化所得之款，在寺内建造了一所能容纳几百儿童的孤儿院，同时把龙泉寺的大殿、斋堂、门脸也加以修饰，彩画一新。

龙泉孤儿院，在北京是最早成立的一个慈幼机构。经费来源主要靠向北京各行业经常性的募化；另外在寺中存放灵柩，寺后设有义地，收进很多租金，对外佛事，也颇有收入。孤儿院时常收进儿童，也有的经过抚养成人，出院独立谋生。经常收容的儿童总有三四百人，年

龄多在七八岁至十四五岁，这些儿童只有少数是无父母亲属的孤儿，而绝大多数双亲健在，只是由于家庭负担过重，无力抚育，不得不忍着骨肉分散、生离死别的痛苦，送到龙泉孤儿院来。每逢院方收容孤儿时，必须令其亲属立下：“今后家中对孤儿的生死存亡不得责难过问”等等卖身契的字据，然后由院方给其父母一笔数目极少的钱财，作为孤儿卖身的代价。

龙泉孤儿院管理儿童的负责僧人有：百川（后任院长和龙泉寺的住持）、严慧（北京旗人，与我同戒）、古峰（河南人）等人。抚养教育问题，由庙中选派僧俗人等负责。孤儿们每天念书之外，还学习织布、印刷、制墨等等手艺。为儿童便于实习，在寺中又陆续附设了几个工厂，并对外界接受定货。每逢初一、十五，全体孤儿到寺中给住持、督监等僧人叩头，名为“云集”。对待犯了错误的儿童是用禁闭一日、不给饭吃或责打等方式来惩罚。严慧、古峰都经常在袍袖内藏有藤条，用以鞭打犯错的生徒，孤儿因此给严慧起了一个绰号，叫他“基督徒”（讽刺他并不信佛）。每当儿童在院

中玩耍，如见到严慧由此经过时，就一哄而散，各自逃避。这些孤儿在院中因工作繁重，衣食不得温饱，由弱而病，继之死亡的人很多，因而经常看到孤儿院的堂役扛着小匣子（即小棺材）去掩埋病死孤儿。长大出院的孤儿们，一般既不知道自己生身父母何在，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。他们所操的行业，多是小茶役、小和尚或饭馆的小伙计等等，如怀朴、朱增都在天津千佛寺当过茶役。千佛寺的住持本泰，也是出身于龙泉孤儿院的。

龙泉寺的孤儿院在明净接办之后，又在寺中开办了一个光明玻璃公司，除技术人员是由寺外聘来的，其他的工作全由这些孤儿义务承担，获得利润统归寺中所有。所出产品大宗是煤油灯罩和金鱼缸等，都由各专门行业到寺批发。

明净后来因病，把住持让给百川，退座后不久病死。

百川任龙泉寺住持兼孤儿院院长，轻易不到寺中，长期在外化缘，经常赴天津、上海等处募化，出入乘坐包月车，穿绸裹缎，使用奴

仆，吃喝嫖赌，穷奢极侈，且有外家。为了满足他的挥霍享受，大肆浸润了孤儿院的经费，严重危害着院中孤儿的生活，孤儿的生活比前更加艰苦。至解放时，百川携眷逃往他方，下落不明。

拈花寺

拈花寺坐落在北京德胜门内，建自明代。万历年间，徧融禅师自蜀来居。师善募化，每出必以牛自随，牛为之负米归寺，岁以为常。后师死，不久牛亦死。寺僧建祖师殿以东，徧融旁塑一牛像，人呼之为牛道士。每年正月间，祖师殿受香火，檀施甚盛。从清末至日军投降，该寺住持一直是由全朗担任，他控制着京城内外整个的临济宗（佛教禅宗五派之一）。所有临济宗的各寺庙，每逢更换住持，均由全朗做主。禅门中的临济宗僧徒占全国僧众绝大多数，当时在丛林中流行着：“临半天，曹一角”的话语。说明临济宗僧徒最多，曹洞（佛教禅宗五派之一）只占一角。

全朗是京兆宛平县田村人，俗家以养骆驼为生，在北京后门华严寺出家。他既久据拈花寺的法席，又因临济宗风盛极一时，所以声势异常煊赫。他的法徒很多，其中量源（河北邢台人）、慧深（河南人）、龙宝（武清人）、本悟（北京人）、际安（北京人）等，都是他的得力助手。从1919年左右，自北京佛教会成立以来，全朗一直担任会长。不久，在京南方僧人认为全朗办会浪费，由观音寺住持觉先、龙泉寺住持明净等倡议组织了南方佛教会。于是全朗把北京佛教会改组为北方佛教会，自任会长，由上方山兜率寺（房山县）住持清池任副会长，这就是北京佛教会南北分派的缘起。

北京西直门外有笑祖塔院（明代笑岩和尚坟），是北京临济宗的祖坟，每逢农历清明、十月初一，这一派在京的僧伽，都到该处扫墓，其仪式均由全朗主持。全朗通过这些关系，掌管了北京临济宗各寺庙。各寺更换住持，必须由他确定。因此各寺庙每当僧人争做住持时，多有向他行贿的（全朗惟利是图，一向是从行贿多者中选）。贤良寺（王府井冰碴胡同）是

临济宗的寺庙，寺中僧人为了争做住持，互相倾轧。全朗因接受了双方的贿赂，无法确定人选，遂唆使两方起诉，他假手法院和解了事。当时所称的“僧阀”，全朗是其中之一。

1926年全朗把寺内律堂改为拈花寺小学，为了筹划小学经费，曾向京津各界大事募捐，当时周学熙的家属捐助最多。该校由全朗担任校长，本悟任督监，灵光（蓟州人）和省元（浙江人，曾任某省省长，起名省元）为督学，居士曾某为汉文教员。每天功课有：上殿礼佛，二时课诵，《佛教三字经》，《八大人觉经》，《佛遗教经》及国文等课程。招收的学生，是市内外各庙的幼僧。学制是三年毕业。每期招收学生百余人，所立校规甚严，入学后的幼僧一律不准出庙。每天子夜上殿礼佛，念经，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，搞卫生、文化学习、过斋堂、再上文化学习，直到晚九时才就寝。每日睡眠时间只有三四小时。校方执行校规非常严格，幼僧偶一触犯，即旋以严厉的体罚。学校的早饭是稀粥、咸菜；午饭是窝头、素菜，还按佛教“过午不食”的戒律为学生们立下一条校规，

因而每天只有早午两餐。幼僧们过着吃不饱、穿不暖、睡不足、工作累、体罚重的惨苦生活，个个面黄肌瘦，体力孱弱，因而病死、逃亡的人很多。例如：前门外财神庙的小和尚德宝就因为睡眠不足，藏在厕所的大粪纸筐中睡觉。又如：德胜门外大钟寺住持体仁（武清县人）将其家乡小庙中12岁的小和尚演空，送到拈花寺小学学习。演空因为忍受不了饥饿和责打，越墙逃回大钟寺。体仁大怒，将演空责打后，派我（当时在大钟寺挂单）将其送回拈花寺小学。又如：德胜门内大石桥西双寺的小和尚清山，在拈花寺小学上学，也经受不住挨打受饿，逃出拈花寺，不敢回到他原来出家的西双寺去，流浪街头数月。时值寒冬，身患重病，无奈哀求西双寺收留，遭到拒绝。清山在庙外哀求到深夜，次日拂晓死去。由于校规苛刻，生活惨苦，每期招收学生，虽是来者不拒，始终招不满名额。拈花寺小学到1945年结束。

全朗做住持时期，先后传戒十余次，每次约有四五百人，所收皈依弟子很多。他又结交了不少的皇亲贵胄，达官显宦，如那亲王、摄

政王、庆亲王、吴佩孚、张镇芳、孙传芳、卢永祥等人。吴佩孚与他更为密切，曾一度住在拈花寺中。此外北京的银行界、国药行等等富商，也多是他的好友。全朗对外善于交际，对内管理却十分专断保守。当时北京的电灯已普遍应用，而拈花寺还维持着点煤油灯的旧习惯。直到日军投降前夕，才安上电灯。他对待寺中僧众，约束很严，稍有不合规矩者，经常笞责；对来寺挂单的僧众扣存戒牒，不准出寺。

在日军统治时期，全朗充当伪北京佛教协会会长，又是伪组织同愿会的发起人之一。同愿会由汉奸头子王揖唐任会长，全朗任理事长，他同时也是日华佛教联合会的骨干分子，为“大东亚圣战”大卖力气。他是“大东亚阵亡将士追悼会”的策划者和积极参加者，经常利用各种场合为日军侵华政策进行宣传。为了向日军表示诚心诚意的“亲善”，他曾几度去日本“访问”。回国后利用座谈会、答记者问、讲经、宴会等方式，替日军做义务宣传，宣传日本的“文明”和政策的“英明”等等奴化言论。他还“代表”佛教界去东北参加“满洲国国庆

节”的活动；又派其得意法徒量源去日本。日军投降后，全朗、量源因逃避汉奸罪，到处躲藏，后曾一度被捕。解放后，师徒二人相继死去。

法 源 寺

法源寺在宣武门外法源寺前街，初名悯忠寺。唐太宗贞观十八年，督师亲征高丽，次年七月班师还至营州，诏移阵亡士卒遗骸集葬柳城，并自为文祭悼。抵幽州，复竣建佛寺，为忠魂祉福，赐名悯忠寺。寺有高阁著闻，有“悯忠高阁，去天一握”的传说。唐初至今，已千余年，阁址久废，惟余断碑三截，砌于墙间，碑上有御史大夫思明的名字。明正统七年重修，赐额崇福。万历三十五年又重修，清初改名法源寺。自清末历任住持都是湖南人，北京人士把它同广济寺等湖南人做住持的寺庙，统称为湖南派的寺庙。清末湖南僧人在法源寺做住持的是道阶。

道阶是湖南衡山人，别号“八不头陀”，在